

病例报告：抗击非典的话语实践*

田海龙

提要 以卫生部新闻办公室 2003 年 4 月 21 日至 5 月 20 日发布的病例报告为样本, 通过分析这 30 篇病例报告的“话步”结构(move structure), 发现在这些语篇中, 有些信息被增加进来, 有些信息被删除出去, 还有些信息被重新启用。在借鉴 Fairclough 关于话语是社会实践论述的基础上, 提出病例报告为抗击非典的话语实践, 并分析病例报告中信息变化及其生产者的社会地位和利益愿望之间的关系, 指出新闻办公室在客观报告病例数字的同时, 积极利用符号和话语资源进行话语实践, 通过对信息的调控来指导抗击非典的斗争, 为语言运用开拓了新方向, 为社会语言学研究开拓了新领域。

关键词 非典病例报告; “话步”结构分析; 话语实践; 社会地位; 利益愿望

2003 年,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袭击了中国大地, 非典型性肺炎这一恶魔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从 4 月下旬起, 北京的病人急剧增加, 许多医护人员受到感染。尤为严重的是, 由于人类还未认识其传播规律, 也未掌握其治疗技术, 这种恶性传染病给人们的心灵带来了极大的恐慌和不安。面对疫情,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部门积极制定应对措施, 全国上下团结一致, 众志成城, 抗击非典, 到 5 月中下旬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6 月 24 日, 国际卫生组织解除对北京的旅游警告, 全国的抗击非典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

抗击非典斗争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 也有许多干预措施对控制非典的蔓延起到积极的作用, 其中之一就是疫情公告制度。卫生部新闻办公室从 4 月 21 日起每天发布全国病例报告, 准确、真实地报告全国非典病例数字。病例报告以表格数字的形式向公众公布病例的变化; 同时, 病例报告还以文字语篇的形式向公众介绍疫情的发展。表格中的病例数字是全国各地向卫生部报告的客观数字, 文字语篇是新闻发言人对这些数字的重新编码。在这个重新编码过程中, 新闻办公室真实地再现了这些数字(田海龙 2003)。然而, 既然是重新编码, 也不可避免地解释了这些数字, 而且, 由于语言的一维特征, 一些数字信息被突出出来, 一些数字信息被掩饰起来; 随着抗击非典的发展, 一些信息被增加进来, 一些信息被删除出去。突出哪些信息, 掩饰哪些信息; 增加哪些信息, 删除哪些信息, 成为新闻办公室的选择。本研究试图分析这些选择的方式, 揭示这些选择所蕴涵的思想以及由此形成的话语实践。

* 本研究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汉语篇章批评性分析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批准号: 03BYY024。

一 理论背景

话语研究是多角度的。形式主义认为话语是超出句子的语言单位，与词素、小句一样共存于语言的等级系统之中(Schiffirin 1994:24)，其话语分析仅局限于话语的内部结构上，把话语的理想化形式作为研究的对象。功能主义认为话语即语言运用(Fasold 1990:65, Brown and Yule 1983:1)，其对话语的分析孤立在一个直接的情景之中，试图描写话语的结构和运用规则。即使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话语，侧重点也有不同。Foucault(1984)把话语看作是规则系统，是对某一命题在某一社会环境中出现的限制。他认为，具体的话语受潜在的常规惯例约束，这些常规惯例是相互联系的组合，包括社会条件和社会结构，其总和成为话语秩序。Fairclough(1989、1992、1995)对话语的研究侧重于话语的社会实践性，认为话语是社会实践的一个形式，或“时刻”(moment)；话语在社会实践中形成，并在社会实践中发挥作用。Fairclough关于话语是社会实践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个内容(Chouliarake & Fairclough 1999:22-28)。

(1) 社会实践是一种生产形式。

社会生活中，人们总要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活动。Fairclough认为生产资料并不仅仅是指物质原材料，符号材料也属于生产资料。人们可以运用符号成分(如文字、图象、体裁等)生产话语。新闻办公室运用病例数字、文字、体裁、结构等符号成分生产出病例报告话语，也是一种实践。

(2) 社会实践是一个网络系统。

社会实践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运用物质和符号资源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某种活动。对社会实践进行研究，其中一种方法就是把它分成几个“时刻”(moment)，研究彼此的关系。如Harvey(1996)把社会实践分成六个时刻：社会关系、权力、物质关系、信仰/价值观/欲望、机构/仪规和话语。为了更好地研究话语与其他时刻的关系，这六个时刻被浓缩成四个：物质活动(特别是非符号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程序，心智现象、话语(Chouliarake & Fairclough 1999:61)。话语包括书面、口头的语言以及图象等非言语交际的符号。

把话语作为社会实践来进行研究，主要是研究话语与社会实践其他时刻的关系。一方面研究话语与“社会关系和社会程序”这一时刻的关系，一方面研究话语与心智现象的关系。“社会关系和社会程序”包括话语生产者所处的社会地位、对信息的支配程度以及发布信息的权力等等；心智现象包括话语生产者的利益、愿望和期望等等。以上这两个关系是单一社会实践内部的关系。然而，社会实践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彼此联系的。Fairclough将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称为社会实践的网络系统。他认为除了研究社会实践内部各“时刻”的关系之外，还应该在社会实践的相互关系中研究社会实践，研究社会实践的外部关系及其对社会实践内部关系的影响。

(3) 社会实践具有反射性。

社会实践的反射性表现在人们总是用话语再现他们的所为，而且这种再现也是一种所为。社会实践的这一特点表明理论与实践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人们对实践的反映所形成的知识是一种有社会倾向性的知识，既是社会斗争的资源又是社会斗争的场所。另一方面，任何社会实践都离不开话语，这不仅因为实践包含语言运用，而且因为话语

对实践的构建本身也是实践的一部分。

与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的话语研究相比,以 Fairclough 的话语研究为代表的批评话语分析更多地容入了权力和意识形态等课题,在更广阔的社会环境中研究话语的生产与运用,这是一个进步,但也存在一些不足。Scheuer (2003) 就曾指出, Fairclough 坚持将文本与社会实践联系在一起,但他并没有充分地说明哪种社会理论在背后支持社会实践的概念,也没有阐明社会实践的分析中怎样运用文本以外的数据。有鉴于此,本研究吸收 Fairclough 批评话语分析的进步之处,将话语置于社会大环境中进行研究,同时又排除文本以外数据的影响,使话语与实践建立起直接的联系,提出病例报告是抗击非典的话语实践这一概念。话语实践是指人们运用话语参与的社会活动,运用符号资源进行的社会实践活动。我们认为病例报告是话语实践,主要是强调新闻办公室运用病例数字、文字、体裁、结构等符号资源生产病例报告的实践活动;而强调它是实践活动则表明话语实践对其他实践活动能够产生一定的作用和影响。

对病例报告话语实践的分析包括两个方面。

(1) 对文本的描述。文本在本研究中是指新闻办公室根据全国各地向卫生部报告的病例数字重新编码组成的病例报告文本。对病例报告文本的描述主要包括段落描述和“话步”结构(move structure)描述。根据 Fairclough (1989、1992、1995) 和 Chouliarake & Fairclough (1999) 提供的批评话语分析框架,文本描述是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前提。本研究以“话步”结构描述病例报告文本,以此作为话语实践分析的基础。

(2) 对话语实践的分析。这里我们借鉴 Fairclough 把话语作为社会实践进行分析的方法,来分析病例报告文本的“话步”结构变化与新闻办公室的社会地位、利益愿望之间的关系,研究病例报告的发布者在对病例数字的重新编码过程中是如何通过对“话步”的取舍来实现其话语实践的,并通过话语实践来促使抗非典斗争朝着自己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二 病例报告文本描述

我们收集了从 2003 年 4 月 21 日到 5 月 20 日卫生部新闻办公室每天发布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报告的病例数字,这个时期全国非典病例经历了由突然升高到缓慢下降的过程,具有典型性。病例报告首先以数字表格的形式发布,包括:序号、省别、临床诊断病例(包含医务人员)、疑似病例、死亡人数、出院人数,各项内容还包含新增、累计等内容(见附录一)。我们的 30 个样本除了最后三天增加了“新增诊断病例和新增疑似病例的最后报告日期”外,病例报告内容一直没有变化。

我们还收集了从 2003 年 4 月 21 日到 5 月 20 日卫生部新闻办公室发布的病例报告文本。这 30 篇病例报告是办公室对当天病例数字的重新编码。我们以这 30 篇病例报告为样本,分析研究病例报告的话语实践。

描述这 30 篇病例报告文本往往会从段落描述开始。4 月 21 日的第一篇病例报告有 4 个段落,前三个提供病例信息,最后一个是评论;从 4 月 22 日到 5 月 1 日,病例报告变成了 3 个段落(26 日为 2 个段落),但无论是 2 个还是 3 个段落,都是提供病例信息;从 5 月 2 日到 19 日,提供病例信息的段落增加到 4 个;5 月 20 日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评论段落。这 30 篇病例报告提供的病例信息包括:疫情概述、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

很明显,以段落为基础描述病例报告的结构过于粗略。为了更加细微地描述病例报告,

我们采用 Swales (1990、2001) 提出的“话步”结构分析方法。“话步”最初是界定体裁特征的一个概念，也用来分析一种体裁的整体结构。“话步”结构代表一个文本的信息结构。在本研究中，病例报告的信息结构由“话步”结构代表，一个“话步”也就是一条完整的信息。Swales 发现，科技文章的“话步”结构与段落结构并不重叠 (1999、2001)，一个段落往往包含几个“话步”。我们在确定病例报告的“话步”时，一般以句号作为话步的结束，但也有例外，如“其余 17 个省份报告没有新的病例。”一句列入第一话步，第二话步也包含两句。这是因为话步的划分主要依据信息的分类。

下面是病例报告文本的 14 个“话步”及其代表的意义，可参见附录二。

话步 1：当天疫情总体叙述

话步 2：有疫情的省份 / 无疫情的省份

话步 3：病例数在 5 例和 10 例以下的省份

话步 4：未发现疫情省份 / 在一定期间没有新发病例报告的省份

话步 5：当天全国新报告的诊断病例、治愈及死亡总数

话步 6：当天各省市新报告的诊断病例、治愈及死亡数

话步 7：全国累计报告的诊断病例、治愈及死亡总数

话步 8：各省市累计报告的诊断病例、治愈及死亡数

话步 9：当天全国新报告的疑似病例总数

话步 10：当天各省市新报告的疑似病例数

话步 11：当天排除疑似病例数

话步 12：全国疑似病例总数

话步 13：各地疑似病例总数

话步 14：评论

三 病例报告的话语实践

观察这 30 篇病例报告文本“话步”结构的变化，我们发现一些“话步”被新增加到病例报告中，另一些“话步”被删除，还有一个“话步”被重新启用（见表 1）。有研究表明，语言项目的选择体现出交际者的思想倾向，如名词、动词、人称以及主题的选择都体现出选择者的意识形态 (Yew-jin Fang 2001, Oktar 2001, Kong 2001)；结构的变化同样也暗示着选择者的意识形态，突出有利于自己的论点、淡化其他论点等都可用来操纵听众 (van Dijk 1999:28-29)。病例报告中“话步”的取舍同样体现出选择者的意识形态取向。我们通过分析病例报告样本的信息变化与新闻办公室的社会地位和利益愿望之间的关系，来揭示新闻办公室运用符号和话语资源进行话语实践，参与抗击非典社会实践的过程。

表 1 每天病例报告文本中包含的“话步”

话步 日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5月20日***	✓	✓	✓	✓	✓	✓	✓		✓	✓	✓	✓		✓
5月19日	✓	✓	✓	✓	✓	✓	✓		✓	✓	✓	✓		
5月18日	✓	✓	✓	✓	✓	✓	✓		✓	✓	✓	✓		
5月17日	✓	✓	✓	✓	✓	✓	✓		✓	✓	✓	✓		
5月16日	✓	✓	✓	✓	✓	✓	✓		✓	✓	✓	✓		
5月15日	✓	✓	✓	✓	✓	✓	✓		✓	✓	✓	✓		
5月14日	✓	✓	✓	✓	✓	✓	✓		✓	✓	✓	✓		
5月13日	✓	✓	✓	✓	✓	✓	✓		✓	✓	✓	✓		
5月12日	✓	✓	✓	✓	✓	✓	✓		✓	✓	✓	✓		
5月11日	✓	✓	✓	✓	✓	✓	✓		✓	✓	✓	✓		
5月10日	✓	✓	✓	✓	✓	✓	✓		✓	✓	✓	✓		
5月9日*	✓	✓	✓	✓	✓	✓	✓		✓	✓	✓	✓		
5月8日	✓	✓		✓	✓	✓	✓		✓	✓	✓	✓		
5月7日	✓	✓		✓	✓	✓	✓		✓	✓	✓	✓		
5月6日	✓	✓		✓	✓	✓	✓		✓	✓	✓	✓		
5月5日	✓	✓		✓	✓	✓	✓		✓	✓	✓	✓		
5月4日	✓	✓		✓	✓	✓	✓		✓	✓	✓	✓		
5月3日*	✓	✓		✓	✓	✓	✓		✓	✓	✓	✓		
5月2日	✓	✓			✓	✓	✓		✓	✓	✓	✓		
5月1日*	✓	✓			✓	✓	✓		✓	✓	✓	✓		
4月30日	✓	✓			✓	✓	✓		✓	✓		✓		
4月29日	✓	✓			✓	✓	✓		✓	✓		✓		
4月28日	✓	✓			✓	✓	✓		✓	✓		✓		
4月27日	✓	✓			✓	✓	✓		✓	✓		✓		
4月26日**	✓	✓			✓	✓	✓		✓	✓		✓		
4月25日					✓	✓	✓	✓	✓			✓	✓	
4月24日					✓	✓	✓	✓	✓			✓	✓	
4月23日					✓	✓	✓	✓	✓			✓	✓	
4月22日					✓	✓	✓	✓	✓			✓	✓	
4月21日***					✓	✓	✓	✓	✓			✓	✓	✓

* 增加“话步”的日期。

** 增加和删除“话步”的日期。

***重复“话步”的日期。

3.1 “话步”的增加

从4月21日到25日，病例报告由8个话步组成，即当天全国新报告的诊断病例、治愈及死亡总数（话步5）、当天各省市新报告的诊断病例、治愈及死亡数（话步6）、全国累计

报告的诊断病例、治愈及死亡总数（话步 7）、各省市累计报告的诊断病例、治愈及死亡数（话步 8）、当天全国新报告的疑似病例总数（话步 9）、全国疑似病例总数（话步 12）、各地疑似病例数（话步 13）和评论（话步 14）。从 4 月 26 日开始，增加了 3 个话步，即话步 1、2 和 10，分别表达当天疫情总体叙述、有疫情的省份 / 无疫情的省份和当天各省市新报告的疑似病例。如：

话步 1：4 月 26 日，全国内地 10 个省份报告有新增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病例，6 个省份报告有新增疑似病例，其余 15 个省份为零报告。

话步 2：截至 4 月 26 日 10 时，报告有疫情的省份为 26 个。

话步 10：其中北京 173 例；天津 27 例；河北 9 例；山西 18 例；内蒙古 18 例；黑龙江 1 例；上海 4 例；浙江 1 例；安徽 1 例；河南 1 例；湖北 3 例；广东 61 例；广西 2 例；重庆 1 例；四川 3 例；陕西 4 例。

以上三个话步在病例报告的 30 个样本中一直延续到底。而在 5 月 1 日又增加了“当天排除疑似病例”（话步 11）的信息，5 月 3 日增加了“未发现疫情省份 / 在一定期间没有新发病例报告的省份”（话步 4）的信息。如：

话步 11：4 月 30 日 10 时至 5 月 1 日 10 时，各地报告排除疑似病例 116 例。（5 月 1 日）

话步 4：海南、贵州、云南、西藏、青海五个省份尚未发现疫情。另外，福建已经连续 25 天没有新发病例报告，江西、山东连续 9 天没有新发病例报告。（5 月 3 日）

在以后的病例报告中更多的省份被加到这两个信息项目中。5 月 9 日病例报告中又增加了“病例数在 5 例和 10 例以下的省份”这样的信息（话步 3），如：

话步 3：在报告有疫情的省份中，黑龙江没有临床诊断病例报告；安徽、上海、湖北、湖南、甘肃、宁夏等省份，累计临床诊断病例在 10 例以内；江苏、浙江、重庆、福建、辽宁、江西、山东等省份，累计临床诊断病例在 5 例以内。

在所收集的 30 天病例报告样本中，一共有四天的病例报告增加了新的信息，4 月 26 日增加了三条信息，5 月 1 日、3 日和 9 日分别各增加了一条信息。这六条信息分别由话步 1、2、10、11、4 和 3 代表。从话语与心智现象的关系角度来分析这六条新增信息，可以发现这些信息完全符合新闻发言人的心理，满足他的愿望，实现他的期望。例如，4 月 26 日的病例报告新增了“全国内地 10 个省份报告有新增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病例，6 个省份报告有新增疑似病例，其余 15 个省份为零报告”（话步 1）的信息。这也是他的愿望所在。在抗击非典的初期，人们抱怨信息不准确，新闻发言人希望通过提供更详细的信息来平息这种抱怨。

新闻办公室希望抗击非典的形势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这很自然。5 月 1 日，病例报告增加的“各地报告排除疑似病例 116 例”（话步 11）的信息就充分体现了他的愿望。在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与日俱增的形势下，即使是疑似病例的排除也可以抹去笼罩在人们心头的一缕愁云，增强人们战胜非典的信心。发言人似乎已看到新增信息的效力，5 月 3 日和 9 日又分别增加了话步 4 和话步 3。随着病例报告中出现“一些省份在许多天之内没有新发病例报告”和“许多省份病例数在 5 例和 10 例以下”这样的信息，人们紧张的心情进一步放松，感到疫情正在得到控制。这也是发言人所期待的。他通过选择增加信息的方式实现了他的期望。以话步 4 为例。福建已经连续 25 天没有新发病例报告是客观事实，但是在第 25 天而不是在别的哪一天公布这一事实，却是新闻办公室选择决定的，这个决定也体现出他希望疫情

尽早得到控制的愿望。

下面我们从话语与“社会关系和程序”的关系角度来观察这六条新增信息。如前所述，“社会关系和程序”（Fairclough 称为“社会实践的时刻”）由讲话人的社会地位来体现。在本研究中，它涉及新闻办公室对话语的控制权力。增加哪些信息、怎样增加，不是个人的随意所为，而是社会机构的意志要求。以 4 月 26 日增加的话步 2 为例。话步 2 明确指出“截至 4 月 26 日 10 时，报告有疫情的省份为 26 个。”但全国内地省市自治区的总数人人皆知，其暗示的 5 个省份没有疫情报告也不言而喻。如此看似矛盾的表达方法，正如 Hodge & Louie (1998:99) 指出的那样，“是汉语形成意识形态所必须的部分”。在非典蔓延的时期，正面强调有多少省份没有病例报告可能会不被认可，因此，新闻办公室在 4 月 26 日增加报告了有疫情的省份，其意图在当天如果还不十分明显的话，在 5 月 3 日则再明显不过了，因为 5 月 3 日又增加了话步 4：海南、贵州、云南、西藏、青海五个省份尚未发现疫情。这种对信息的控制权力只有处于社会实践主导地位的新闻办公室才拥有，它与话语实践的关系十分密切。

3.2 “话步”的删除

随着抗击非典社会实践的发展，病例报告的话语实践也呈现动态变化的特征。在一些话步被增加进来的同时，一些话步也被从病例报告中删除出去。在所收集的 30 个病例报告样本中，只有一天的病例报告删除了已有的两条信息，即 4 月 26 日删除了各省市累计报告的诊断病例、治愈及死亡数（话步 8）和各地疑似病例总数（话步 13）。

话步 8：其中，广东 1317 例（医务人员 329 例），治愈出院 1136 例，死亡 48 例；北京 482 例（医务人员 8 例），治愈出院 3 例，死亡 2 例；吉林 3 例；陕西 1 例；辽宁 2 例；广西 14 例，治愈出院 8 例，死亡 3 例；湖南 6 例，治愈出院 5 例，死亡 1 例；河南 3 例；内蒙古 30 例（医务人员 4 例），死亡 6 例；上海 2 例。（4 月 21 日）

话步 13：其中北京 610 例，山西 61 例，广西 1 例，内蒙古 48 例，湖南 1 例，四川 7 例，上海 8 例，河南 1 例，吉林 1 例，河北 7 例，陕西 4 例，天津 2 例，新疆 1 例，重庆 1 例。（4 月 21 日）

在非典肆虐的 4 月下旬，人们处于极度的恐慌之中。4 月 26 日，在报告了 5 天各地的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之后，发言人在以后的病例报告中果断删除了这两条信息，使人们不再天天听到看到自己所处的城市有这么多的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感到自己不再被非典病人所包围。这种状况是新闻办公室所期望的，他的期望通过相关信息的删除得到了实现。同时，他通过话语实践参与了抗击非典的社会实践。发言人对信息的控制权使得他可以任意删除那些与他的利益相抵触的信息，控制了信息，也就掌握了社会实践的主动权。

3.3 “话步”的重复

在区分的 14 个“话步”中，有一个表达“评论”的信息，出现在所收集的 30 个病例报告样本的一头一尾。这或许是个巧合，但在某种程度上也表明抗击非典的一个阶段。4 月 21 日，发布病例报告的第一天，新闻发言人解释了北京疑似病例数字增高的原因。这个表示评论的话步（话步 14）一直到 5 月 20 日才重新出现在病例报告中。

话步 14：北京报告的疑似病例数增加较多，主要是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加大了排查力度，将过去分散在有关医疗机构的隔离观察病例，进行集中收治。（4 月 21 日）

话步 14：根据各地的疫情报告，总的看，全国内地非典型肺炎新增病例持续下降，疫

情趋于平缓。但防治工作任务仍很艰巨，需要坚持不懈，再接再厉，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成果。（5月20日）

病例报告是对全国各地统计的非典病例数字的文字表述，应该客观准确。田海龙（2003）通过对一篇病例报告样本中动词及物性、情态和主题的分析，发现关系过程占全部动词过程的85.54%；病例报告通篇全部是无生命主语，有生命主语出现率为零，情态状语中的评论状语的出现率也为零；标记主题占71.43%，无标记主题仅为28.57%，平均1.4个独立小句就有一个标记主位。这些统计结果表明新闻办公室试图最大程度地客观再现这些病例数字。然而，新闻办公室由于其机构的性质，往往掌握着对信息的支配权力，也容易被赋予权力来实施其话语宣称实施的行为（Bourdieu1991:8）。作为机构，新闻办公室期望抗非典斗争朝着他们所期望的方向发展，所以新闻办公室不失时机地实施话语实践，主动指导抗击非典斗争。一旦可能或条件允许，他们就要运用符号这种生产资料来生产话语，通过话语实践来实现他们的目的和愿望。信息的增加是如此，信息的删除是如此，评论的重复更是如此。这样看来，4月21日和5月20日的评论（话步14）正是实现其目的的一种话语实践策略。

四 结语

我们从“话步”结构的角角度描述了4月21日到5月20日30篇病例报告样本，试图揭示新闻办公室的权力与期望对病例报告生产过程的影响。病例报告的生产过程是一个话语实践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闻办公室利用自己对信息的支配权力，不断地将与自己利益一致的信息增加到病例报告中去，同时将与自己利益相悖的信息删除出病例报告，而且还适时地对形势进行评论。新闻办公室对病例数字重新编码的话语实践推动了抗击非典的社会实践向着有利的方向发展。

病例报告话语实践的正面效力在后来专家对抗非典斗争的分析中得到验证。全国非典型性肺炎防治组疫情分析专家金水高2003年5月18日分析全国及北京市疫情的趋势时认为，从4月21日到5月18日，北京市确诊病例占全国的比例平均为62.3%，最高时为78%（4月28日），因此研究北京市疫情的变化与趋势对于研究全国的疫情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他指出，北京市疫情趋势4月下旬以后大概可以分为几个阶段：从4月21日到4月底，发病处于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从5月初开始，与前一个时期相比，疫情开始有一个小的回落，但仍然处于很高的水平；5月9日到18日，北京市的疫情有比较大的下降（金水高2003）。金水高划分的三个阶段基本涵盖本研究搜集的样本，也可在病例报告中“话步”的变化上找到痕迹。如第一阶段体现在4月26日“话步”的增减和5月1日“话步”的增加；第二阶段体现在5月1日和3日“话步”的增加和5月9日“话步”的增加；第三阶段从5月9日增加话步3作为标志一直延续到划分的日期。三个阶段的划分与“话步”的增加与删除如此一致，以第二阶段最为明显。根据金的划分，第二阶段始于5月初，结束于5月9日。在5月1日和3日的病例报告中新闻办公室分别增加了话步11和话步4。话步11报告了排除的疑似病例，话步4报告了未发现疫情的省份和连续25天和9天没有新发病例报告的省份。这两条信息的内容并非出现在当天，但在当天报告这些内容却体现了新闻办公室对抗击非典形势的判断与期望。在第二阶段结束的5月9日，话步3又被增加到病例报告中。话步3报告了非典病例少于10例和5例的省份的信息，这无疑与新闻办公室的集团利益相一致。病例信息的增加与删除代表抗击非典斗争一个阶段的开始与终结，这不能只用巧合来解释，

更具说服力的解释应从病例报告话语实践的研究分析中做出。

分析人士认为,政府采取的干预措施在抗击非典斗争中发挥了作用(金水高 2003)。本研究显示,这些干预措施也包括病例报告这一话语实践。Volosinov(1973)曾经指出,话语在社会中产生,同时社会也要通过话语来建构。新闻办公室在客观报告病例数字的同时,积极利用符号和话语资源进行话语实践,通过对信息的调控指导抗击非典斗争,达到稳定群众情绪,鼓舞群众斗志的目的,为语言运用开拓了新的方向,也为社会语言学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

参考文献

- 金水高 2003 <http://www.sina.com.cn>, May 18, 2003. Xinhua.
- 田海龙 2003 病例报告:多模式话语的社会实践,全国第八届语用学研讨会(广州)论文。
- Bourdieu, P. 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London: Polity Press.
- Brown, G., & Yule, G. 1983. *Discourse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ouliaraki, L., & Fairclough, N. 1999. *Discourse in Late Modernity: Rethink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Fairclough, N. 1989. *Language and Power*. London: Longman.
- Fairclough, 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Fairclough, N. 1995.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Longman.
- Fairclough, N., & Wodak, R. 1997.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T. Van Dijk. (ed.), *Discourse as Social Interaction*(pp. 258-284).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Fang Yew-Jin 2001. Reporting the same event? A critical analysis of Chinese print news media texts. *Discourse & Society* 12(5): 585-613.
- Fasold, R. 1990.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Language*. Beijing: FLTRP and Blackwell.
- Foucault, M. 1984. The Order of Discourse. In M.J. Shapiro (ed.), *Language and Politics*(pp. 108-138).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Harvey, D. 1996.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London: Blackwell.
- Hodge, B., & Louie, K. 1998.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Kong, K., C. C. 2001. Marketing of belief: Intertextual construction of Network marketer's identity. *Discourse & Society* 12(4): 473-503.
- Oktar, L. 2001. The ideological organization of representational process in the presentation of us and them. *Discourse & Society* 12(3): 313-346.
- Scheuer, J. 2003. Habitus as the principle for social practice: A proposal for CDA. *Language in Society* 32(2): 143-175.
- Schiffrin, D. 1994. *Approaches to Discourse*. Oxford: Blackwell.
- Swales, J. 1990/2001. *Genre Analysi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Van Dijk, T. 1999. Discourse analysis as ideology analysis. In C. Schaffner & A. Wenden (eds.), *Language and Peace*(pp. 17-33). Amsterdam: 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
- Volosinov, V. 1973.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附录一：全国内地非典型肺炎疫情统计表（截至5月9日10时）

序号	省别	临床诊断病例		医务人员		出院人数		死亡人数		疑似病例		
		新增 ^①	累计	新增	累计	新增	累计	新增	累计	新增	排除	合计
1	北京	48 (28)	2177 ^②	3	372	16	168	2	114	54	87	1425
2	天津	9 (5)	141	2	66	0	2	1	6	11	1	123
3	河北	9 (4)	156	0	15	2	11	2	8	6	3	109
4	山西	11 (6)	400 ^③	0	76	15	69	0	17	14	22	138
5	内蒙古	20 (10)	284 ^④	3	42	3	16	1	17	10	5	193
6	辽宁	0	2	0	0	0	0	0	0	0	0	3
7	吉林	0	26	0	6	0	0	0	3	0	0	7
8	黑龙江	0	0	0	0	0	0	0	0	0	0	4
9	上海	0	6	0	0	0	0	0	1	4	4	12
10	江苏	0	5	0	0	0	0	0	0	1	0	23
11	浙江	0	4	0	0	0	0	0	0	0	1	4
12	安徽	0	9	0	0	0	0	0	0	2	0	13
13	福建	0	3	0	0	1	3	0	0	0	0	1
14	江西	0	1	0	0	0	0	0	0	0	0	2
15	山东	0	1	0	0	0	0	0	0	1	1	1
16	河南	0	15	0	1	1	3	0	0	0	0	14
17	湖北	0	6	0	1	0	0	0	0	1	0	15
18	湖南	0	6	0	0	0	5	0	1	0	0	3
19	广东	17 (7)	1502	1	345	15	1288	0	56	38	36	414
20	广西	0	20	0	0	0	9	0	3	0	1	3
21	重庆	0	3	0	0	0	0	0	0	0	0	7
22	四川	2 (2)	13	0	0	0	4	0	2	1	0	17
23	陕西	1	12	0	1	0	2	0	0	1	1	27
24	甘肃	1	7	0	0	0	0	0	1	0	0	3
25	宁夏	0	6	0	0	0	2	0	1	0	2	5
合计		118 (62)	4805	9	925	53	1582	6	230	144	164	2566

①括号内为由疑似转为临床诊断数。

②北京排除原临床诊断病例7例（其中医务人员1例，转疑似病例2例）。

③山西排除原临床诊断病例2例。

④内蒙古排除原临床诊断病例2例。

附录二：病例报告样本（卫生部新闻办公室5月9日下午通报全国内地非典型肺炎疫情）

（话步1）5月9日，全国内地14个省份有非典型肺炎病例报告，其中8个省份报告有新增临床诊断病例和疑似病例，1个省份报告有新增临床诊断病例，5个省份报告有新增疑似

病例。其余 17 个省份报告没有新的病例。(话步 2) 截至 5 月 9 日 10 时, 报告有疫情的省份为 25 个。海南、贵州、云南、西藏、青海、新疆 6 个省份未发现疫情。(话步 3) 在报告有疫情的省份中, 黑龙江没有临床诊断病例报告; 安徽、上海、湖北、湖南、甘肃、宁夏等省份, 累计临床诊断病例在 10 例以内; 江苏、浙江、重庆、福建、辽宁、江西、山东等省份, 累计临床诊断病例在 5 例以内。(话步 4) 福建已经连续 31 天没有新发病例报告, 湖南连续 18 天没有新增临床诊断病例报告, 山东连续 15 天没有新增临床诊断病例报告, 广西连续 7 天没有新增临床诊断病例报告, 宁夏连续 6 天没有新增临床诊断病例报告, 江西连续 5 天没有新增临床诊断病例报告。

(话步 5) 5 月 8 日 10 时至 5 月 9 日 10 时, 全国内地共报告新增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病例 118 例 (其中 62 例为疑似病例转为临床诊断病例), 治愈出院 53 例, 死亡 6 例。(话步 6) 临床诊断病例中, 北京 48 例 (其中 28 例为疑似病例转为临床诊断病例, 20 例为新发病例), 治愈出院 16 例, 死亡 2 例; 天津 9 例 (其中 5 例为疑似病例转为临床诊断病例), 死亡 1 例; 河北 9 例 (其中 4 例为疑似病例转为临床诊断病例), 治愈出院 2 例, 死亡 2 例; 山西 11 例 (其中 6 例为疑似病例转为临床诊断病例), 治愈出院 15 例; 内蒙古 20 例 (其中 10 例为疑似病例转为临床诊断病例), 治愈出院 3 例, 死亡 1 例; 福建治愈出院 1 例; 河南治愈出院 1 例; 广东 17 例 (其中 7 例为疑似病例转为临床诊断病例), 治愈出院 15 例; 四川 2 例 (为疑似病例转为临床诊断病例); 陕西 1 例; 甘肃 1 例。(话步 7) 截至 5 月 9 日 10 时, 全国内地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病例 4805 例 (其中医务人员 925 例), 累计治愈出院 1582 例, 死亡 230 例。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的 2993 例。

(话步 9) 5 月 8 日 10 时至 5 月 9 日 10 时, 各地报告新增非典型肺炎疑似病例 144 例。

(话步 10) 其中北京 54 例; 天津 11 例; 河北 6 例; 山西 14 例; 内蒙古 10 例; 上海 4 例; 江苏 1 例; 安徽 2 例; 山东、湖北各 1 例; 广东 38 例; 四川、陕西各 1 例。

(话步 11) 5 月 8 日 10 时至 5 月 9 日 10 时, 各地还报告排除疑似病例 164 例, 其中北京 87 例; 广东 36 例; 山西 22 例; 内蒙古 5 例; 上海 4 例; 河北 3 例; 宁夏 2 例; 天津、浙江、山东、广西、陕西各 1 例。(话步 12) 截至 5 月 9 日 10 时, 全国内地非典型肺炎疑似病例累计为 2566 例。

Case-Reporting Discourse:

A Discursive Practice in China's Anti-SARS Social Practice

TIAN Hailong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a continuum of discourses produced by the news office of the Health Ministry of China when the office interprets the SARS case-numbers reported to it from April 21 to May 20 in 2003. The study analyzes the schematic move structure of the 30 case-reporting discourses and identifies the constant addition and omission of information to and from the discourses. Deriving from Fairclough's conception of discourse as social practice, the study takes the production of case-reporting discourse as a discursive practice and explores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anti-SARS social practice in terms of its relation to the office's social position

and expectation.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news office's preference and ignorance of information in the production of case-reporting discourse positively intervene in the anti-SARS social practice and this discursive practice opens new fields for language use as well as for the study of sociolinguistics.

Key words SARS case-reporting discourse; move structure analysis; discursive practice; social position; interest and expectation

(田海龙 天津商学院外国语学院 /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